

书林漫步

以历史烛照未来

◎汪微

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每读一遍都要被深深地感动。

历史从来不是过去式，也不会是完成式，它始终与当下和未来息息相通。抗战胜利80年来，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初心，在平凡中坚守信念，在困境中传承精神。王树增的高明之处在于，超越了历史叙事的既定框架，笔锋直指人性深处。英雄的鲜血浸透了田畴旷野，不死的英灵守望着河岳山川。透过王树增全景式的描绘，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无数平凡人的坚守支撑着民族的脊梁。

书中还原抗战历史血与火的大量真实细腻故事情节令人热血沸腾，譬如描写平型关伏击战：“没有子弹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这种异乎寻常、悲壮的战斗造型，分明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具象化；又如再现“八女投江”：“她们正值青春韶华，也许笑起来有酒窝，也许初有心仪之人……”读者感受到的是气壮山河的背后，平凡女性对生命的炽爱与决绝。

在娓娓讲述和评论抗战故事的过程中，王树增并不满足于简单还原史实，而是试图解答更深层的追问：为何军事装备如此落后的中国能奇迹般地拖住强敌直至胜利？《抗日战争》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在宣示：英雄并非天生神勇，却要做出平凡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生死抉择。事实上，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强大底气，正是蕴藏于整个民族共同谱就的命运交响曲。从张自忠将军身陷重围时怒目斥敌的干云豪气，到罗雨丰营长在生死关头对着部下“跟老子上”的一声怒吼，再到那位精心喂养炕头上八路军伤员的普通大娘手中的一勺勺米汤……一幕幕、一场场，都是支撑抗战走向胜利的强大基石。

在王树增笔下，无数军人和民众都在演绎着中华民族最危险时刻用血肉筑就长城的动人故事。即使身陷地狱，英勇无畏的中华儿女也会在装备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创造奇迹，载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抗战的最终胜利也离不开一些极富正义感的民族资本家，比如上海实业家卢作孚在日军进攻南京时，为了断绝日军退路，毅然将自己的大批船只沉于江阴要塞，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王树增发出这样的感慨：“没有这些人，你解释不了这场战争，他们捍卫的其实是一个尊严。”这样的描写突破了“抗战只是军人之事”的写作套路，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有力保障。

“舍此抗战，别无他途。”但是打赢一场战争只能说是阶段性的胜利，而绝非历史的终点，后续的进程需要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民族精神中不断作出历史反思，得到现实启示，对后人来说永不过时。



《冰雪女皇》

插图选(4)

埃德蒙·杜拉克 绘

公主决定嫁给一个聪明的男人。



新书快递

欧陆分野： 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达沃斯

[美]彼得·戈登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29年春天，马丁·海德格尔和恩斯特·卡西尔在瑞士达沃斯进行了一次公开对话，这两位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交流了涉及哲学史上最紧迫的问题：人类的有限性是什么？客观性是什么？文化是什么？真理是什么？

人比AI凶

万维钢
新星出版社

当AI无所不能，你靠什么不可替代？超级人工智能会带来哪些冲击？你该如何正确使用AI，而非被它替代？模型可以被训练，你的心智该如何升级？怎样才能拥有决策

的智慧？

完美脸蛋

[美]伊莉丝·胡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于个人而言，爱美是天性。于一国而言，让爱美变成服美役，导致了全方位的消费主义。这反过来又激励美容业变本加厉地制造“理想美”的标准，美容业最终造成大量的偏见和社会不公。

麻将：从东方到西方

[美]安妮莉丝·海因茨
上海大学出版社

麻将大致成型于清末民初，将上海的美国侨民、爵士时代的美国白人、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华裔、战时被监禁的日裔美国人、犹太裔美国郊区母亲和战后空军军官的妻子联系起来，促进不同族裔间交融。

菲萨克译《小银和我》

◎鸩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作家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散文诗集《小银和我》，中文译本已接近二十种。众多译者中最受欢迎的一位，竟然是西班牙汉学家达西安娜·菲萨克。她的译本先后出版过六次，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中国和平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浙江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二〇一三年版，中信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二〇二四年版。

一个外国人将母语文学经典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认可，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成功案例。试想，一个中国人将中国文学经典译成外文，如“典籍外译”项目之类，要在国外得到普通读者的好评，那是多么难得的情形。

现今，菲萨克已是一位出版过《汉语语法精要》的著名汉学家，但她翻译《小银和我》时只有二十五岁。据说，她当时的汉语老师张宝

书边杂写

“他的母亲”

◎萧规

1940年10月21日，重庆文艺界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晚会，老舍出席并发言，提到周作人在1936年10月29日北京大学“鲁迅先生追悼大会”之上“报告鲁迅先生的生平时似乎说过‘他的母亲’四个字，当时听得非常刺耳，好像这位周老太太并非周作人的母亲似的”。似乎自此以后，周作人“对老母不孝”的劣迹便广为流传，甚至1946年11月9日在受审时，审判长即就此发过问。

如果仅就周母鲁瑞称谓而言，周作人在日记里面未尝不谓之为“母亲”，且其死后，也循例称之为“先母”，并写过两篇悼亡文。一为《先母事略》，见于《知堂回想录》；一为《先母行述》，见于1995年版《周作人集外文》、2009年版《周作人散文全集》。关于《先母行述》，两书均未交代史料来源，至于成文年月，前者括注“1943.4作”，后者则明确为“1943年4月19日作”，依据或即原文“时为4月18日酉时乃遂长逝”的话。奇怪的是，《先母事略》记载鲁瑞卒于4月22日，而周作人日记所载亦然，那么这篇《先母行述》岂不成了“预制”之文？

2020年，《集外文》再版，《先母行述》改题《先母事略》，原文“时为4月18日酉时”被校订为“时为4月18日，至22日酉时”，并附注出处为“1943年5月15日《同声月刊》第3卷第3号”，乃知初版颇有脱误。遗憾的是，《散文全集》（修订版）依旧沿误未改。不过，《同声》似非该文最初发表之处，比它稍早的是5月1日《晨报》所载《周母鲁太夫人事略》，其按语说，“作人先生孝思纯笃，追念慈范，倍增哀痛，因于丧中亲撰太夫人事略，对太夫人生前懿行及先生昆仲早年生活均多记述，为外间罕传之史料”，却脱一字而衍一字。职是之故，周作人遂转交《同声》再刊，也未可知。此外，《先母事略》铅印原件尚有存本，由国家图书馆收藏。

书评书话

玮曾参与了翻译的过程，却不愿署名。尽管如此，她的汉语天赋仍然让人惊叹不已。

通览菲萨克译《小银和我》的各种版本可知，中信版对译文作了大量的修订。除了词句的加工完善，还改动了一些关键性的意象。这表明译者汉语表达能力有所精进，对目的语和源语言的理解都有所加深。新近问世的江苏凤凰版采用的并非这个修订版，而是人民文学的初版本，不知何故？